

On Adam Smith

论亚当·斯密

尚新力◎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论亚当·斯密

尚新力◎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亚当·斯密 / 尚新力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2

ISBN 978-7-5117-1224-0

I. ①论… II. ①尚… III. ①亚当·斯密 (1723-1790) —思想评论 IV. ①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5982 号

论亚当·斯密

出版人：和 羲

责任编辑：周新力

责任印制：尹 琨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5 (编辑室)

(010) 66161011 (团购部) (010) 52612332 (网络销售)

(010) 66130345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70 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7.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前 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到今天已经发表整整 235 年了，而他的《道德情操论》也更有 250 多年了，以斯密思想形成的以自然自由为根本的公序良德和市场经济已经在我们的人类世界遍地开花，生根结果。斯密成为了近现代文明社会的思想奠基人和伟大开创者。尽管我们这 200 多年来风风雨雨，跌跌宕宕，但我们仍然前行在斯密所指引的道路上，每一次的经济危机，每一次的道德拷问，我们都是在对斯密的怀疑和误解的缥缈不定中更加坚信斯密思想的正确和睿智，斯密所呈现在我们人类面前的自由与富裕的逻辑总是在紧紧地扼住我们命运的灵魂，使我们宁静、沉思和反省。

斯密作为情感主义的道德哲学家，作为创立经济科学体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作为其思想代表的一生中仅有的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为斯密赢得了极高的光荣和辉煌，使他成为举世闻名的伟大思想家。可是关于这位思想巨人，我们却存在太多的误解，在现实社会的困境中又有着太多的疑问——斯密是自由主义还是自由放任主义？斯密是个人主义还是极端个人主义？斯密是只讲利己而不言利他？斯密强调“看不见的手”就意味着无政府主义？斯密崇信自然法则就是放弃了国家法制？斯密尊重人的本性就是轻视社会规则和公共秩序？斯密赞扬人类美德就会淡化社会道德准则？我们重温斯密，只是希望把一个真实的斯密从我们编织的谜团中剥离出来，把一个清晰和正确的斯密从我们臆造的误解中摆脱出来。我想，我所看到的斯密，既

不是一个神秘化的，也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而是一个真实和客观的斯密。

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无论中国怎样发展，我们要相信斯密，因为斯密的思想给我们带来了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富强，带来了举世瞩目的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与和谐。相信斯密，就要敬畏市场和那只“看不见的手”；相信斯密，就要坚持道德准则和社会正义；相信斯密，就要尊重自由和平等；相信斯密，就要爱戴自然、自由和我们每一个自己。我呈现给大家的斯密，就是一个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斯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以至将来，斯密将是一个永存永恒永远的斯密。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绪论 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1
一、斯密生平简要	/ 1
二、斯密思想溯源	/ 5
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 10
第一章 斯密与《道德情操论》	15
一、我们每个人都有同情心	/ 18
二、同情的合宜性——公正的旁观者	/ 25
三、人类美德的源泉	/ 34
四、怎样看待我们的激情	/ 38
五、幸运或不幸下的同情	/ 52
六、对富人或穷人的同情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	/ 54
七、崇富嫌贫是人类的劣德	/ 58
八、我们既需要仁慈更需要正义	/ 65

九、命运对我们道德情感的影响	/ 92
十、我们如何评判自己的情感和行为——论人的良心	/ 101
十一、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规范以及我们的义务	/ 130
十二、我们能以效用来作出道德判断吗	/ 141
十三、习惯和风气对道德情感的影响	/ 149
十四、我们应该如何评判个人德行的美德品质	/ 153
十五、践行美德的自我控制	/ 165
十六、美德的本质是什么	/ 175
第二章 斯密与《国富论》	179
一、交换分工与国民财富	/ 182
二、国民财富应该给谁	/ 185
三、国民财富再产出财富	/ 189
四、人类在历史上如何创造自己的财富	/ 192
五、国民财富不断增长的机制 ——自由的市场以及干预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吗	/ 193
六、政府在财富的创造中应该做什么	/ 197
第三章 斯密思想的现代启示	202
一、政府与市场——我们更需要谁	/ 202
二、经济上的利己与道德上的利他	/ 212
三、建立我们可行的社会	/ 219
参考文献	228
后记	230

绪 论

我们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一、斯密生平简要

1723 年 6 月 5 日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港口城市柯科迪（又译卡柯尔迪）。

1737 年在斯密 14 岁时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当时 14 岁上大学属于比较正常的年龄）。大学期间深受道德哲学家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影响，哈奇森教授对自由、理性和实用主义的追求，坦陈直言的个性以及挑战权威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斯密。此间，哈奇森还把 16 岁的斯密介绍给了当时正在写作《人性论》的哲学家大卫·休谟，由此，休谟成为了斯密学说得以创立的又一重要领路人。

1740 年，17 岁的斯密，获得了牛津大学斯内尔学院奖学金，同年赴牛津大学求学，历时六年之久，但是英格兰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在牛津大学当然也就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的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包括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古典著作、休谟的《人性论》以及古代重要思想家的一系列作品，因此在斯密头脑中建立了坚实的古典和当代哲学的基础，为他以后写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特别是其经济学素养得到很快提高。

1746 年，斯密在奖学金期满时离开了牛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柯科

迪，在家乡斯密进行了两年时间的写作，论述了有关文学、物理学、逻辑与科学方法的问题。

1748 年，斯密接受当时英国著名律师和思想家凯姆斯勋爵的邀请，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英国文学和法国哲学。从斯密的授课讲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那时二十多岁的斯密已经形成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比如劳动分工，这为其多年以后问世的经典著作《国富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751 年，27 岁的斯密回到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以及文学等。其道德哲学课程当时涉及神学、伦理学、法学和公共政策（有学者认为即是政治学）四大部分，其中有关法学与公共政策学又包括了当时所称的政治经济学。据与斯密同代人的回忆，斯密的道德哲学课程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自然神学，主要讨论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上帝的特性，考察了作为宗教基础的人类大脑活动所必须遵守的各项原则；第二部分为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讲义则是后来的《道德情操论》中所表达的主要理论内容；第三部分则较为详尽地论证与正义有关的一部分道德学内容并成为后来的“法学讲义”，同在第三部分中还包括了后来《国富论》的基本思想，诸如价格体系的运行机制、保护主义的缺陷、政府机构与经济制度的设计等，这些都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后来的《国富论》中，可见那时的斯密已经成为自由贸易学说的坚定信奉者，已经基本形成了《国富论》中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斯密在回忆从 1751 年到 1764 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的 13 年时，说是他“一生中最有用和最幸福”的时期，因为在此期间斯密以《道德情操论》为题出版了他的伦理学著作，且以此为基础深入了经济学的研究并在格拉斯哥大学发表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此演讲后被埃德温·坎南根据其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成《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一书于 1896 年出版。

1759 年，斯密将自己有关伦理方面的著述与讲义结集出版，这就是使他一举成名的原创性著作《道德情操论》。后来斯密的朋友、世人皆知的哲学家大卫·休谟又把此书送给了自己的一位朋友政治家查尔斯·汤申德，此人读后不胜感慨，立即表示以每年 300 英镑（终身享有）的

高薪聘请斯密担当其继子、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

1764年3月，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和他的学生巴克勒公爵开始了法国游学之旅。游学是当时每一位年轻贵族接受教育的普遍内容。在巴黎，大卫·休谟的陪伴给他们的游学旅行增添了令人兴奋的元素。在整个国外旅行的两年半时间里，无论是在图卢兹，还是在巴黎、日内瓦，或者是法国的广大南部，斯密记录了大量有关欧洲文化、政府、商业、管制及经济生活的事，将其与英国国内的情况进行对比。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斯密在法国与欧洲著名思想家的讨论和交流，其中法国古典经济思想家们诸如魁奈、杜尔阁——重农主义学派对其影响更为深刻，获益颇丰，并对《国富论》的写作产生深远影响。正如斯密1764年7月在法国图卢兹给休谟的信中所说，我已开始写一本书。这本书应该就是十多年后出版的举世经典《国富论》。

1766年11月，游学结束，斯密返回伦敦。在伦敦停留的半年中，斯密利用建立不久的大英博物馆藏有的丰富资料，继续进行《国富论》所要论述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767年5月斯密又重新回到了家乡柯科迪，购买住所并接母亲及堂妹同住，终身不婚，一直悉心侍奉母亲直至她1784年去世。1767年后的斯密大多时间居住柯科迪忙于《国富论》的写作，1773年携《国富论》原稿赴伦敦，意于最后稍加润饰即行出版。但在其伦敦的研究工作和与许多重要人物的交流探讨中，不少重要性的问题超出了他的预料，包括法国重农主义者杜尔哥寄给他的新资料《关于课税的备忘录》，当时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殖民统治活动日益加剧，1775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等等，由此促使斯密有必要继续研究有关问题而不急于发表《国富论》，后来斯密对《国富论》进行了广泛修改和补充，有时是整章整章地改写，甚至是重新审定自己原来的一些主张，直至1776年《国富论》成功出版。

1776年3月，经济思想巨著《国富论》最终出版，使得斯密成为经济科学的鼻祖。

1776年5月到12月，斯密除了偶尔去爱丁堡等地外，主要还是住在家乡柯科迪。

1777年的大部分时间斯密住在伦敦，原因是再版他的著作《国富论》，虽然直到1778年才再版。年底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专员，于是住到了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1778年1月底，斯密正式接到了海关专员的委认书，担任了年薪五百英镑的苏格兰海关专员和年薪一百英镑的苏格兰盐税专员，同时每年仍从巴克卢公爵那里领取三百英镑的年金，金钱未必代表成功，但在斯密身上则是例外，证明了当时人们对斯密思想的信赖和对斯密品格的爱戴。这位对英国专断低效的海关体制的重要批评家终于获得了可以有所作为的职位，斯密生活无忧且工作勤奋，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未缺勤或迟到，斯密被公认是一位责任心很强的行政官员，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能休假一星期而不会受到任何责怪或议论。斯密同时发现税务专员的公务对经济学研究大有帮助，《国富论》第二版中的大部分增补和订正都与公共事业有关则证实了这一点。此外，斯密还就其他问题诸如反对对爱尔兰实施贸易限制、美洲殖民地的“动乱”等问题向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后来，英国在一些内外政策的制订上都采纳了斯密的意见。

1778年到1790年，斯密居住在爱丁堡他租下的“潘穆尔府邸”，同住的还有他的母亲及其亲属。其间，1783年参与创建爱丁堡皇家学会以促进各门科学知识的发展；1784年《国富论》在初版、再版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增补部分以第三版发行；1786年在《国富论》的前言略有增加又出版了第四版，这是斯密生前审订的最后一个《国富论》版本；同年4、5月在伦敦治病休养并且被邀参与了作为斯密学说信徒的英国首相皮特提议的税务改革；1787年至1789年斯密被任命为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问世三十年重印五版后对其加以增补和删节发行新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是增加了一章：“论道德情操的堕落。堕落的原因是我们倾向于有钱有势的人，而鄙视贫穷卑贱的人”，新版《道德情操论》是斯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

1790年7月，斯密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当他预感到自己的时日已不多时恳求他的朋友销毁了自己的十六册手稿，在斯密临终前的一个星期天他向最后一次聚会的朋友们告别，“诸位，我很喜欢和你们待在一

起，但我不得不和你们分手，到那个世界去”，“我们不得不在另一个地方聚会了”。1790年7月17日星期六斯密与世长辞，安葬在苏格兰的斯密故乡柯科迪镇的卡农加蒂教堂墓地，享年67岁，在他简朴的墓碑上写着：亚当·斯密，《国富论》作者，安眠于此。“亚当·斯密为现代世界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论证了我们今天称之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稳定性和发展趋势，而这种稳定性和发展趋势的思想又是源于斯密发现的黄金法则——看不见的手”，2005年2月6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斯密墓前的一席话表达了我们后来人对斯密的感激和崇敬之情。

二、斯密思想溯源

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近代哲学的发端点，此时在十七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迎来了十八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兴起、启蒙运动活跃的时代，也是继文艺复兴运动后近代人类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并由此最终建立了现代文明的新政治、新文化、新经济的人类社会。在英国的启蒙运动中最为鲜明的特性是纯粹理论哲学让位于世俗哲学，人们开始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新世俗人生观基础上思考人类自身的本性和地位，开始更加深入地研究人生问题，也更加深入地关注人类内在本性的反省，从经验的发展观点来考虑人类的精神生活。众所周知，启蒙运动发端于英国，然后传播至法国，而后者更胜于前者的是，法国的启蒙运动的理想追求产生了对社会现实、政治现实的猛烈反对，而且更加勇猛地攻击教会和政府的现存制度，最终引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将法国领入了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德国接受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开始来自法国，后来直接来自英国，而德国的显著特点是在德国人缜密思维的传统下人文主义的思想达到了炉火纯青、心灵净化的崇高境界。

显而易见，在那个时代的英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首先应该是培根，他于1620年发表了《新工具》，其中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表明了对经院哲学的批判精神，后来在1624年发表的《论说文集》更是提出了人与社会、人与自己、人与自然关系的许多

独到见解，开启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大门，以科学代替迷信，人权代替神权，人性代替天启。其次应该是霍布斯，他于 1651 年发表了《利坦维》，使他成为了培根唯物论原则和经验主义思想的鲜明继承者。霍布斯反对君权神授论而提倡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反对天赋观念论而推崇经验主义机械论的理性认识论，尤其是包含着“自然权利说”——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和“自然法则说”——人的理性规定的道德律令这样两大部分的伦理思想，更是将人、人性、人的本质和人的存续的探究推向了更高层面。最后就应该是洛克，他分别于 1690 年和 1685 年发表了《人类理智论》和《政府论》，使其成为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和天赋人权学说的先声，他的名言“我的茅草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成为当今全世界自由主义者和人权至上主义者的强有力的辩护词。洛克认为人类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来自于人类的感官经验，人的心灵最初只如一张白纸，而在白纸上所能书写的内容只能来自于经验即观念，而人类的经验或观念只有感觉和反省两种，感觉来自于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反省来自于心智观察本身，二者是我们人类知识的唯一来源。洛克的这一反对天赋观念论的经验认知论哲学思想对后来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贝克莱具有强烈联想主义色彩的经验主义哲学和休谟具有强烈怀疑主义色彩的经验主义哲学。洛克第一次系统提出“天赋人权”学说——人自然拥有的生存权利、享有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自身幸福的财产权利。洛克第一次倡导了国家分权学说——国家政治权力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其中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要受到人民的制约，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立法权属于议会，而后两权属于国王，后来这一思想由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发展成为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显然，洛克将英国的启蒙运动推向了高潮，直接辐射到欧洲大陆，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和北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思想源泉。当然在英国启蒙运动中还有道德哲学家莎夫茨伯利、曼德维尔等等，他们的思想锋芒无一不是在呼唤民主、自由而反对专制的封建统治，崇尚理性、科学而反对世俗迂腐的宗教禁锢，倡导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权利和人的自然道

德而反对天启、神授的迷信观念。解放人类、探求人性、重建人道成为那个时代摆脱蒙昧的思想核心。这些思想观念或者直接影响着斯密或者通过斯密的第一位思想启蒙者哈奇森间接影响着斯密。

哈奇森是斯密 1737 年到 1740 年在哥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遇到的对其一生影响最大最直接的伦理学教授。哈奇森作为英国启蒙运动著名的道德哲学家，以他的思想智慧启发着斯密的良知，指明着斯密的思想方向。哈奇森是英国启蒙运动的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当然他也是斯密出生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于 1725 年发表的《美与德行的观念根源的研究》在启蒙运动中极具影响，是我们至今在论述英国启蒙运动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第一，哈奇森认为，人不仅具有感官的感觉，而且还拥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上的道德感受，人会内生出由外在感受而升华的爱与憎、美与丑、正义与邪恶的评价。人的道德伦理由此形成，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是人们判断他人与自身行为的唯一标准。这就是哈奇森具有独到见解的情感伦理观。哈奇森的这一重要道德哲学观直接影响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也直接影响着休谟的《人性论》，斯密和休谟都是以同情说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道德伦理学说，最终形成了情感主义伦理学派而不同于唯理主义伦理学派。第二，哈奇森不仅强调人性本质的道德情感，把仁爱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而且还把人的道德情感同增进人们的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幸福联系起来，表现出了功利主义思想倾向。哈奇森第一个提出实现尽可能最大多数人的尽可能最大幸福是最好的行为的观点，后来由边沁和密尔加以发展最终建立了古典功利主义学说。同样，斯密也是在人性具有同情、仁爱的强调中，发现了合乎情感的利己主义并补充了理性的利己主义，因此也就奠定了《国富论》的思想基础，使斯密的伦理观和经济观有机地融合起来。

关于哈奇森对斯密之影响的更加具体和通俗的阐述是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

首先，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中，哈奇森的讲课给人印象最深。他是格拉斯哥大学第一个停止用拉丁语而改用本国语讲课的人，而且，他讲

课从来不带笔记，不拘泥于陈规，讲课生动有趣。使学生们感到振奋的不仅仅是他的雄辩，还有他的思想本身。正如我们在他的著作中所感受到的，无论他论述什么问题，总是能够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无拘无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会被他的新思想所触动，而他的自由精神，正是斯密这一代年轻人所认为最宝贵、最有力量的东西。在哈奇森来到格拉斯哥大学的不多几年，校墙外的守旧的人们就把他的思想当作对传统的信仰有危险的“新思想”而进行激烈的攻击，而校墙内的年轻人则感谢他带来了思想，喜欢它的新颖的内容。哈奇森属于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根据人类的本性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发现十八世纪的上帝是善良而仁慈的。上帝只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诞生，上帝的意志不是可以从神秘的奇迹和神意中知晓的，而只能通过对于人类的最大利益也就是哈奇森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广泛考察中来理解。哈奇森强调人学而淡化神学，他向学生们灌输了以下两种看法：第一，道德上的善的标准在于增进他人的幸福；第二，我们即使不知道上帝，或者在知道上帝以前，也能够识别善与恶。毫无疑问，斯密无论是在学校听哈奇森讲授自然神学的课程，还是在哈奇森家中听他讲授某一神学问题，斯密都相信哈奇森宣传的宗教乐观主义，并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次，在政治方面，哈奇森也对斯密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实际影响。哈奇森鼓吹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等项原则，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叛逆行为。而这恰恰是哈奇森的擅长之处，他以他的博才雄辩深刻地阐明了自由的基本原则，使每一位学生都受到了极大的感染，都像他那样热爱自由。斯密当然也不例外，他深切而强烈地热爱一切合乎理性的自由，这正是他追求自由情感和自由经济社会的思想源泉。斯密的这种热爱自由、捍卫自由的性格显然来自于同哈奇森教授的接触，或者由此而萌发，或者因此而被大大地促进。

最后，哈奇森教授还在其他方面对斯密产生了影响。其一，斯密后来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法学时提出的关于财产权的理论，就是从哈奇森那里得到启发的。斯密的财产权理论认为，财产权的基础在于人们和财

产占有者的感情是一样的，都合理地期望享有自己获得或发现的物品而不受侵害。其二，斯密的整个《道德情操论》是在哈奇森教授的启发下提出来的，这一说法的根据是，哈奇森在讲课中曾明确提出并论述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够把道德情操全部归之于共同的感情？哈奇森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其理由是我们常常赞同与我们没有共同感情的人（例如敌人）的行为。而斯密则克服了这一理论的不足，在《道德情操论》中独具匠心地提出：人们一般同公正的第三者怀有相同的感情，从而完善了哈奇森的理论。后来人们还发现，斯密《道德情操论》中的“行为与行为判断；行为判断理论基础是同情心；自然的行为；效用的影响；风俗习惯”等章节的内容明显具有哈奇森道德思想的烙印。其三，哈奇森把政治经济学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而这正像斯密后来在授课讲义上所做的那样。在论述有关契约的问题时，需要考察价值、利息、通货等方面的原则，哈奇森对这些方面的论述虽然不尽全面，但仍不失为具有对经济问题的非凡理解力，他的这些理解和看法深深地影响了斯密。在货币问题上，哈奇森没有陷入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的谬误，而这正是引导了斯密掀起了对重商主义革命的狂飙。在价值学说的某些内容上，哈奇森的理解可以作为斯密有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著名论述的原本来阅读。哈奇森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伟大源泉和价值的真实尺度，而斯密与此相同。哈奇森声称，在不对他人的身体或财产造成损害、不违反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享有的这样的天赋权利，即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运用自己的才能去从事任何工作或娱乐活动，这正是斯密在产业理论方面提出的天赋自由学说，而且，哈奇森和斯密一样，都提出为了公共利益要在某些方面限制这种自由，至于在哪些方面具体实行或废除哪种限制，哈奇森与斯密却不尽相同。哈奇森的学说，实际上就是与斯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自由学说。毋庸置疑的是，斯密最初接触到的经济思想就是从哈奇森那里得到的，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受益于哈奇森远远先于二十年后的法国重农主义者。而且，哈奇森包含着自由、劳动和价值等学说的萌芽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萌芽，在斯密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后来斯密正是根据

这些萌芽中的学说建立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读亚当·斯密

自从亚当·斯密为我们人类提出了在以同情的社会机制基础上可以形成有道德情操的社会和在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基础上可以形成有民富国强的社会的革命性思想之后，我们的世界就在不断地变革和进步，北半球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文明，南半球的绝大部分国家也正在变革向着现代化的目标前进，然而，在这二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终究我们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世界冷战，人类各种冲突所导致的地区间战争从未中断过，仁慈、谨慎和正义的道德准则和普世价值观面临着持续的挑战。在这二百多年的人类历史上，我们终究发生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宣告了拉美模式的破产，发生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宣告了东亚模式的破产，进入 21 世纪我们又经历着 2008 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即将到来的主权债务危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经济制度也面临着持续的挑战。是斯密错了？还是我们背离斯密带来了斯密的复仇？重读斯密的意义就在于此。

然而不可置疑的是，从斯密时代以后的所有变化似乎都是我们在以斯密思想为中心的偏离或回归的波动中发生正向和负向的变化。18 世纪英国取代荷兰成为了世界的中心，20 世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了世界霸主，18 世纪的转移恰恰是产生在斯密思想在英国的鼎盛时代，20 世纪的转移又恰恰来源于美国从英国主流思想文化中的大量借鉴，这是一组相互联系的系统性传导效应，绝非偶然性就可以解释的，也绝非历史的某一个横断面就可以证明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可能就是“看不见的手”对人类不当行为的一个教训，使每一个生产者在痛苦中反思而更加稳健和克制，自此不再有这样的经济危机。但是，那些政治家们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些，在战胜经济危机和挽救人类社会的口号下，开始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更有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支